

从人力资本视角看共同富裕问题

王志刚 项 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缩小人的能力差距,而人力资本则是衡量人的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共同富裕是否能够实现的重要因素。本文选择以人力资本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研究视角,深入阐释了能力差距、人力资本与贫富差距之间的作用机制。为了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基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提出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增强医疗服务保障、优化税制结构、缩小“数字鸿沟”等方面,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解决制约共同富裕的根源性矛盾。

关键词:人力资本 能力差距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4)05-0038-10

一、引言

带领广大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我国庄重宣告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接下来是要逐步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不仅是一项经济目标,更是深刻的社会理念,是要确保全体人民都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迎接更美好生活的崇高目标,也要为全体人

民创造更为平等、公正、可持续的发展机遇。

回顾新中国发展历程,“共同富裕”有着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早期,共同富裕往往作为“两极分化”的对立面而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和实践道路(程恩富、刘伟,2012)。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完善,中国共同富裕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其本质日益明确,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全体人民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享日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最终目标是让全体人民都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地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刘培林,2021;郁建兴、任杰,2021)。共同富裕天然包含了“富裕”和“共享”两个方面,二者缺一

[收稿日期]2023-12-10

[作者简介]王志刚,数据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财税政策评估、数字财政和宏观经济研究;项猛,2021级财政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财政。

不可。同时,共同富裕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必须要和传统意义上的“均富”“共富”思想相区分,这决定了中国共同富裕是消除了两极分化但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李军鹏,2021)。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愈加坚实,但中国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富裕仍然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等诸多挑战(李实,2021)。

诚然,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共同富裕的实现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有力举措,尤其是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在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中发挥的直接作用得到了广泛共识(蒋永穆、谢强,2021;江亚洲、郁建兴,2021)。然而,这些政策路径往往只是从分配方面对共同富裕进行研究探索,属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外力因素”,没有从根本上找到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共同富裕的实现仍然缺乏“内生动力”。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源是人的能力差距,特别是群体性能力差距(刘尚希等,2022)。由于人的智力水平、努力程度等先天禀赋不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个体之间的能力差距,而个人能力对其社会和经济表现具有核心作用,能够影响工资收入,产生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Heckman等,2006;Lindqvist and Vestman,2009)。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又会制约劳动力流动和能力提升,使个人能力差距演变为群体性能力差距,并产生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孙文凯等,2011)。进一步,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能力形成是一个多时期的动态过程,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会相互影响,其中早期的教育回报率更高,即在儿童时期的政策干

预往往能够显著提高他们在成年后的经济社会生活表现,使他们有能力解决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流动带来的诸多难题(Carneiro等,2003;Cunha and Heckman,2009;李晓曼、曾湘泉,2012)。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应从消除人的能力差距着手,政府应全面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减小群体性人力资本差异,努力消除各种机会的不均等,最终体现为“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

通过梳理既有研究,我们发现当前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多沿袭传统分析框架,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或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探索依托于数字技术、科技创新等有助于共同富裕的新方法(夏杰长、刘诚,2021),这些分析研究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参考。与既有研究不同,本文聚焦于人力资本视角,尝试从缩小人的能力差距来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方法。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从人力资本视角展开研究,突显了人力资本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关键作用,丰富当前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二是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以消除人的能力差距、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出发点,为政策制定提供多样化的分析思路,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

(一)理论分析

人力资本思想可追溯至古典经济学派,威廉·佩第“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论断,以及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论述,他们最早揭示了人力资源在社会生产中的价值创造作用,但并未把人力资源看作是一种资本。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可以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能力,这开创了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社会生

产的思想先河。西奥多·W·舒尔茨明确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把人力资本定义为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熟练程度等,并认为可以通过教育、职业训练、医疗保健、迁移和“干中学”等途径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西奥多·W·舒尔茨,1992)。此后,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力资本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其中,贝克尔从微观层面面对人力资本进行了拓展和创新,认为人力资本的内涵不仅包含知识、技能以及才干,还应该把更为重要的健康和寿命涵盖进去;丹尼森则通过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度量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国内部分学者基于我国经济实践进行了拓展分析,提出人力资本可以看作是蕴藏在人身上的一种无形资源,通过人的活动广泛参与到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赖明勇等,2005)。此外,既有研究通过构建人力资本差异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的存量效应与结构效应,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负相关的作用机制(焦斌龙,2011)。教育、健康、人口迁移则是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存量以及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因素,这使得它们在通过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产生收入差距、制约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因(杨建芳等,2006;陈斌开等,2010)。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缩小人力资本差距两方面发力。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差距的相关性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人力资本是影响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且二者之间应存在负相关性,即人力资本越高,贫富差距越小。为进一步验证人力资本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使用世界主要国家的截

面数据(2019年122个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性分析,数据指标包括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力资本指数、高等教育入学率、预期寿命和收入基尼系数,其中人力资本指数来源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库(Penn World Table),高等教育入学率和预期寿命指数来源于世界银行(WB),收入基尼系数来源于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ID)。我们对不同来源数据进行了一定的识别和匹配。

首先,我们考察各国人力资本与基尼系数的相关性。根据图1(a)可以看到,人力资本指数与收入基尼系数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收入基尼系数越小,意味着贫富差距越小。其次,以高等教育入学率和预期寿命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替代变量,分别检验二者与收入基尼系数的相关性。从图1(b)和图1(c)可以看到,高等教育入学率、预期寿命与收入基尼系数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或预期寿命的上升,收入基尼系数下降,进一步表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能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综上,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人力资本与贫富差距呈显著的负相关性,人力资本的差距是阻碍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原因。

人力资本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影响作用还可以从能力差距到收入差距的循环机制来理解。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可以表现为个人能力的大小,在以要素贡献为基础的初次分配中,个人能力是劳动报酬的直接决定因素。因此,个人能力差距会产生收入差距,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之间又存在着循环正反馈机制,高收入者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财富又能创造更高的收入流量。最终,收入差距产生了贫富差距,而贫富差距又能够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接着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又造成了消费差距,而消费又是人力资本,即人的能力提升的关

键,这样就进入下一轮的“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消费差距→能力差距→收入差距”的循环(刘尚希等,2022)。因此,要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缩小贫富

差距,必须从人力资本着手,不断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根本上消除人的能力差距,进而有效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缩小贫富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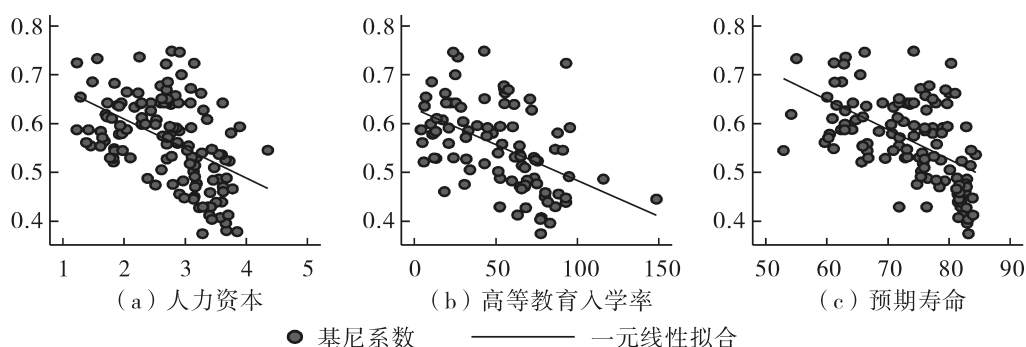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主要国家人力资本与收入基尼系数的相关图

数据来源: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库(PWT)、世界银行(WB)、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ID)。

三、我国居民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现状

(一)城乡居民能力差距

个人能力是完成项目或任务所展现的综合素质,主要包括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等不同形式,本文基于2018年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中户主的相关调查数据,从数字能力、认知能力和金融能力三个方面探析了我国居民能力的差距情况。数字能力形容的是在现代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下,居民能够接受和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水平,以数字信息获取、数字使用频率来衡量图2(a)。相较于数字使用频率,我国城乡居民在数字信息获取方面呈现出一定差距,农村居民获取最新信息的主动性较弱,获取渠道和方式也较为有限。认知能力一般是指人脑加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是人们理解事物,掌握新知识的基础,甚至还会影响个人就业与工资,以及投资决策(Murnane等,1995;亢一鸣等,2022)。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对个人学习能力、认知

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图2(b)可以看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认知能力存在显著差距,具体表现在认词能力、数学能力两个方面,城镇居民的认词能力和数学能力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金融能力指的是个体运用自身掌握的金融知识和技能,参与金融市场投资活动以实现金融幸福的能力,对提高个人收入以及财富积累具有直接影响作用(方舒、王艺霏,2021)。通过定期存款认知、通货膨胀认知、投资风险认知三个角度来度量金融能力水平,见图2(c),可以看到,我国城乡居民的金融能力差距更加显著。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对金融市场的投资理财能力不足,加之农村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不足,使得农村难以享受充裕的金融服务和资产增值收益。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加速创新与应用,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但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共同富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持续深入,能够优化资源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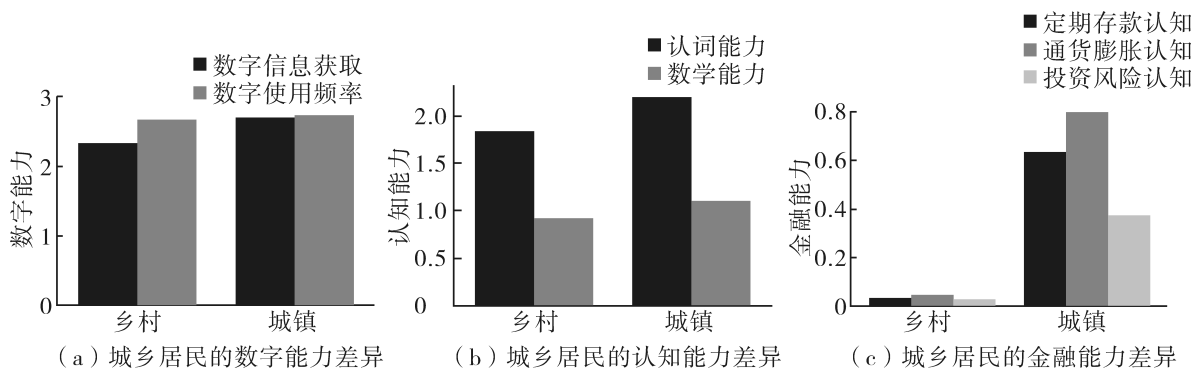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居民认知能力与金融能力差异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

置、加快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此产生巨大的数字红利,进一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王宁、胡乐明,2022)。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根据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生态指数(2023)》(图3),我国不同省(区、市)的数字基础、数字能力、数字应用及数字生态指数差距显著,成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收入公平分配的潜

在制约因素。以农民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因年龄、教育和职业因素影响,缺乏获取数字信息和提升数字能力的有效路径,从而对其就业和发展,以及收入分配会产生直接影响,加剧贫富分化,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李怡、柯杰升,2021)。加快弥合数字鸿沟,缩小不同地区、群体在数字信息获取、数字技能掌握、数字应用能力等方面的差距,不仅是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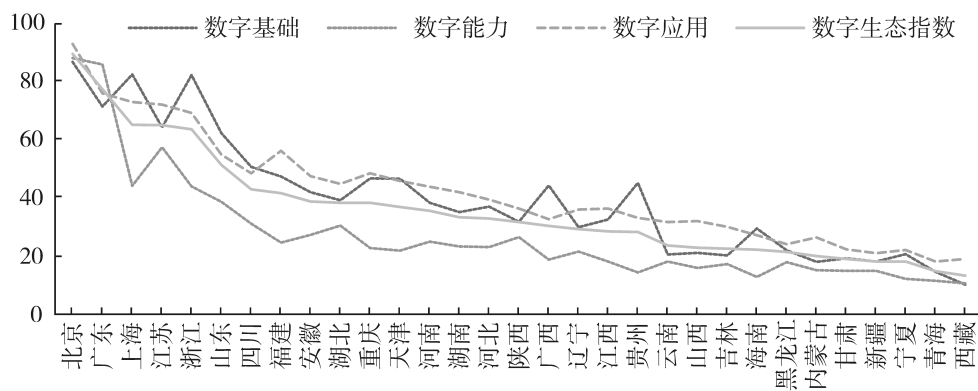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省级数字生态总指数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生态指数(2023)》。

(二) 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

学习教育是提升个人能力、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因此受教育水平往往可以用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根据全国城乡居民受教育年限情况

(见图4),可以看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教育的重视度越来越高,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持续增大,这使得我国教育事业取得显著发展成效。1985年以来城乡劳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在持续上升,至2020年城镇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57年,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19年,较1985年相比,分别提高了3.34年和3.65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劳动力平均受教

育年限差距在2000年之前呈现显著下降态势,之后小幅上升,2005年后开始下降,2010年后重新扩大,并在近几年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城乡居民人力资本差距在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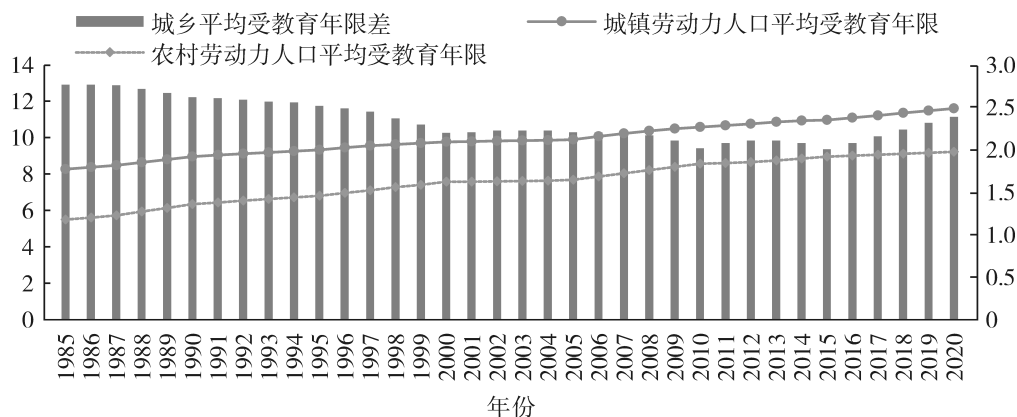


图4 城镇劳动人口、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差额(单位:年)

数据来源: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 http://humancapital.cufe.edu.cn/rlzbzsm/zgrlzbzsm2022/zgrlzbzsbqgw_zw_.htm。

(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主要有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而目前劳动收入是我国城乡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劳动收入的水平决定居民个人的能力水平,因此城乡居民之间的能力差距扩大,会带来收入差距扩大,这反映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工资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差距的变化上。根据图5可以看到,2000年以

来,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工资收入、财产性净收入的差距持续扩大,分别从2000年的3974元、3708元和117元,扩大至2021年的28481元、20523元和4583元。当然从相对差距趋势看,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略有缩小,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从2000年的2.74倍下降到2021年的2.50倍,其中工资性收入相对差距下降明显,从6.32倍下降到3.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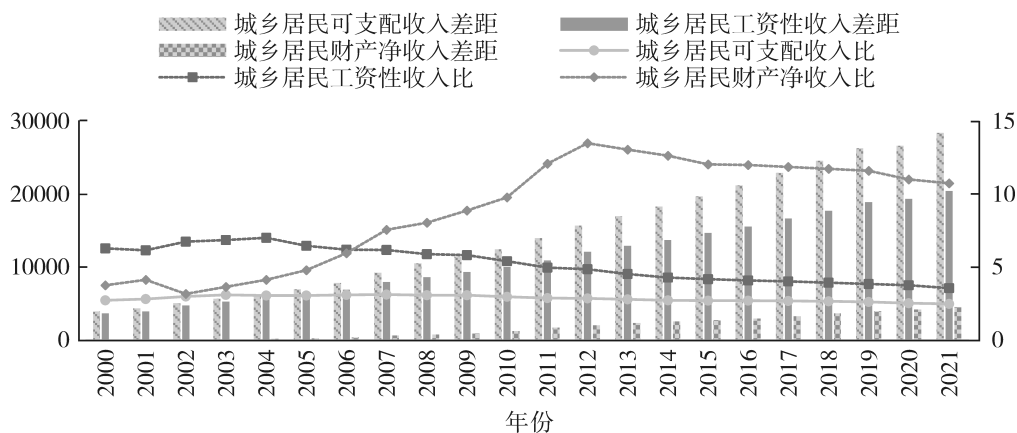


图5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差距(单位: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倍,但城乡居民财产净收入相对差距显著扩大,从3.79倍增长到10.77倍,这意味着财产性收入差距正在逐渐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收入差距尤其财产性收入差距的累计会拉大财富差距,实际上也反映出城乡居民在金融能力或经营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四)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会加大消费差距,而消费差距又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积累和能力差距,最终使得能力差距、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及消费差距之间形成一个循环,加剧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根据图6可以看到,2000年我国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为3313元,2019年扩大至14735元,是2000年的4.45

倍。2020年受到新冠病毒感染影响,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距有所减小,但2021年这一差距再次扩大,达到14391元,是2000年的4.34倍,这意味着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仍有扩大趋势。在消费结构方面,2000年—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但2020年之后又略有上升,至2021年分别上升至28.6%和32.7%。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居民恩格尔系数越高,食品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越大,则用于人力资本的消费支出就相对不足,个人能力提升就越有限,越容易形成收入或贫困的代际传递,从而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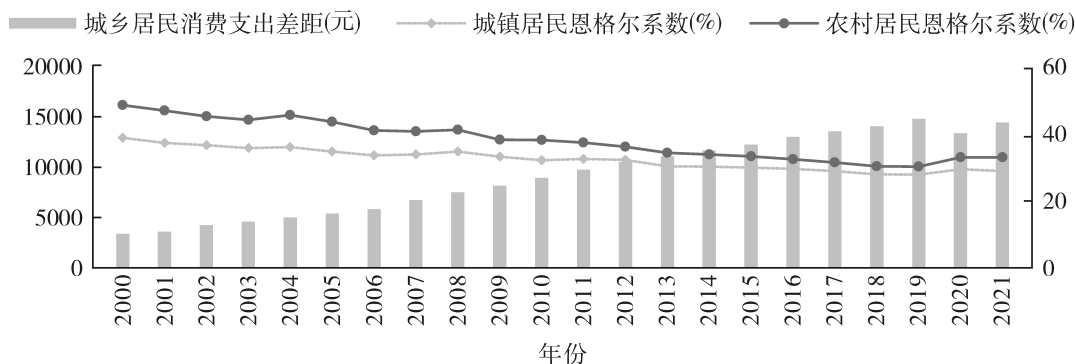


图6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异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单位: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找准症结并对症下药,缩小人的能力差距能够助力共同富裕。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实现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调控手段,也必然会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来推进共同富裕则是优化财税政策的重要思路。

(一)加强以常住人口为依托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不充分,居民发展环境存在很大差距,加之长期实行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固化了社会结构。缩小能力差距必须为全国居民提供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这就要求各项公共政策要“瞄准”流动变化的人口。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比2010年增长88.52%),流动人口达到37582万人。^①长期以来,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为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十分有限。首先,要以降低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户籍关联度为关键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体系,解决好住房、医疗、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保障问题。其次,在城乡规划和项目布局时要充分考虑产业集聚和人口分布的变化,优化行政区划和区域发展规划,提升以中心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要空间形态的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建设更加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此外,要基于人口流动分布的情况及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调整转移支付方向,不断提高资金配置绩效,各类资金投入应更好地与公共消费结合起来,适度扩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类的消费性支出占比,不断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可及性、公平性和质量,促进区域经济更加均衡发展。最后,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要加快推动数字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加快数字财政建设,逐步实现“政策—项目—资金—服务对象”的四位一体,让公共服务流、资金流、数据流融合,从而实现公共服务跟着人走的进程。

(二)顺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优化教育支出结构

教育是缩小人的能力差距,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支出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调整。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全国0—14岁人口比重在2020年有小幅回升,但整体仍呈下降态势,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持续上升^②。全国人口年龄结构矛盾日益凸显,少子老龄化程度持续加重。然而,我国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资源投入不断增加,而且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率,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顺应人口结构变化及时调整教育支出结构。一方面,可以适当降低对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规模,着重缩小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内、城乡间优质教育资源互相流动,尤其是要重视农村落后地区的早期儿童教育,早期儿童投资可以提高儿童的长期表现,减小未来可能产生的人力资本差距。另一方面,结合社会实际需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构建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拓展技术工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空间。此外,要通过产教融合、创新实验、技术应用,重塑教育场景和模式,促进高等教育转型升级,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

(三)增强对脆弱群体的医疗服务保障,防止其因病致贫

健康是人力资本以及能力提升的基础。社会进步带来的生活条件改善、医疗技术提升,为居民健康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和设施,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个人潜力。随着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持续改革深化,全国城乡医疗保障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医疗资源不均衡、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有限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获得医疗服务的能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依然存在。应

^①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http://www.stats.gov.cn/sj/pcsj/rkpc/d7c/202111/P020211126523667366751.pdf>。

^②同上。

进一步完善针对脆弱群体的医疗服务保障,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要加强保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精准性。首先,持续深化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和救助标准,逐步将严重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重、特、慢、大疾病全部纳入重大疾病保障病种范围,提高报销比例,降低脆弱群体的医疗费用负担。其次,对贫困人口、残疾人、孤儿等脆弱群体进行重点关怀,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科学识别,建立起更加完善和精准的医疗保障体系。此外,将社会力量参与纳入社会救助体系,通过财税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捐赠、慈善等形式精准对接特殊困难家庭,进一步帮助减轻困难群体的医疗费用负担。

(四)优化税制结构,健全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

企业、个人或家庭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体,而我国目前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体,直接税占比较低,应进一步推动构建有助于全社会各类主体积累人力资本的税收制度。首先,要形成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积累的税收制度。优化增值税税率,保持合理的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发展壮大,让企业有富余资金用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完善留抵退税、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培训和医疗健康投入,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来实现个人能力与组织发展的同步提升。其次,形成促进个人或家庭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税收制度。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充分考虑家庭人口结构特征以及家庭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努力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税后回报率;完善与升级类消费相关的税收激励政策,促进个人在教育、文化、健康等服务类消费上的支出比重不

断提升,推动个人人力资本积累。此外,减轻医疗、教育机构的税收负担,鼓励医疗、教育机构改善医疗、教育服务,为更多大众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身教育、文化、医疗等各类社会慈善事业,形成与政府财政投入相补充的人力资本投入体系。对企业和个人的慈善行为可以扩大所得税优惠范围,对教育、文化、医疗等公益捐赠可以依法享有增值税、进口税收、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优惠政策。

(五)缩小城乡数字化发展差距,实现数字经济“红利”共享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快速增长,但在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由于信息基础设施薄弱、数字技术接触率偏低、数字素养有限等原因,城乡居民数字化能力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数字化发展差距逐渐显现。要推进共同富裕,必须积极引导数据要素向乡村流动,关注农村低技能群体的数字化能力提升,促进农村居民共享数字经济红利。一是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继续落实农村电信网络、宽带网络、有线电视网络“三网”建设和升级,建设更为完备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适当简化数字平台使用流程,降低操作难度,确保农村居民有兴趣、有意愿参与到数字乡村的建设中来。二是通过线上、线下积极开办农村数字素养、数字技能培训班,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加快乡村振兴的数字人才建设,可以对数字技能不足的人群进行针对性技能培训,逐渐消除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三是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依托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互联网技术,打造低门槛、低风险的金融产品,真正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

大众化,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利用数字技术做好普惠金融的宣传普及,增进农村居民对金融服务的了解认知,逐步提升农村居民应用数字金融的能力和水平,进而提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 [1] 程恩富,刘伟.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剖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06):41-47+159.
- [2]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37(08):117-129.
- [3] 郁建兴,任杰.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J].政治学研究,2021(03):13-25+159-160.
- [4] 李军鹏.共同富裕:概念辨析、百年探索与现代化目标[J].改革,2021(10):12-21.
- [5] 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经济研究,2021,56(11):4-13.
- [6] 蒋永穆,谢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1(04):15-24+2.
- [7] 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J].浙江社会科学,2021(09):76-83+157-158.
- [8] 刘尚希.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中国的逻辑与选择[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08.
- [9] Heckman J J, Stixrud J, Urzua S.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6, 24(3): 411-482.
- [10] Lindqvist E, Vestman R. The labor market returns to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swedish enlistment[J].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9, 3(1): 101-128.
- [11] 孙文凯,白重恩,等.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01):28-41.
- [12] Carneiro P, Cunha F, Heckman J J. Interpreting the evidence of family influence on child development[J]. The Economics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Lessons for Economic Policy, 2003.
- [13] Cunha F, Heckman J J. Investing in our young people[J]. Investing in Our Young People, 2009: 387-417.
- [14] 李晓曼,曾湘泉.新人力资本理论——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动态[J].经济动态,2012(11):120-126.
- [15] 夏杰长,刘诚.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路径与政策设计[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42(09):3-13.
- [16] 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38.
- [17] 赖明勇,张新,彭水军,等.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研究开发与技术外溢[J].中国社会科学,2005(02):32-46+204-205.
- [18] 焦斌龙.人力资本差异与收入分配差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2.
- [19] 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J].管理世界,2006(05):10-18+34+171.
- [20] 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管理世界,2010(01):36-43.
- [21] Murnane R, Willett J B, Levy F.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cognitive skills in wage determination[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5, 77(2): 251-267..
- [22] 亢一鸣,王书华,王小腾.人口老龄化视角下认知能力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2(08):39-54.
- [23] 方舒,王艺霏.金融能力与相对贫困治理——基于CFPS2014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评论,2021,9(03): 181-198.
- [24] 王宁,胡乐明.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2,38(05):20-35.
- [25] 李怡,柯杰升.三级数字鸿沟:农村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J].农业技术经济,2021(08):119-132.

【责任编辑 张经纬】